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内部刊物 免费交流

通讯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2020年3月刊·第3期(总第42期)

本期要目

■ 思想前沿

彰显民族文化特色 推进文旅消费升级

加强劳动教育 培养工匠精神

■ “大系”平台

推进“两大工程” 共谱历史新篇

■ 学术视野

侗族童谣文化遗产亟需抢救和保护

口头诗学的本文概念

■ 文化实践

风雨同舟，以艺抗疫——各地民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文艺创作活动综述（二）

目 录

■ 思想前沿

彰显民族文化特色 推进文旅消费升级.....1

加强劳动教育 培养工匠精神.....2

■ “大系”平台

推进“两大工程” 共谱历史新篇.....3

潘鲁生：齐心协力推进“两大工程”5

邱运华：在中国民协“两大工程”推进视频会议上的讲话.....10

王锦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纂工作进展及2020年度工作计划.....12

■ 学术视野

侗族童谣文化遗产亟需抢救和保护（李生柱）17

往事历历如昨日 哀思念念悼虎彬（齐易）19

· 论文推介 ·

口头诗学的本文概念（尹虎彬） 24

春天的喜神：礼县西和春官说春唱词的价值取向（郭昭第） .. 27

民俗医疗、医疗民俗与疾痛叙事研究述评（戴望云） 30

■ 文化实践

· 国内信息 ·

风雨同舟，以艺抗疫——各地民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文艺创作活动综述（二） 33

来自剪纸界的爱和信心——中国民协抗疫主题剪纸作品特展 .. 35

主 管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 办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理论研究处

主 编

潘鲁生 邱运华

编辑部主任

王锦强

编辑人员

覃 奕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
1号院32号楼B305

投稿邮箱

mjwydt2016@163.com

电 话

010-59759244

010-59759490

本期印刷：2020年4月

· 国际信息 ·

以艺战“疫”：中国文艺小分队参演新西兰北帕多元文化节.....	35
巴基斯坦文学院将以 72 种语言出版民间文学文集.....	36
阿联酋沙迦酋长对阿联酋文化遗产立法.....	37

彰显民族文化特色 推进文旅消费升级

3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宣部、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等二十三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提出，从市场供给、消费升级、消费网络、消费生态、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促进消费扩容提质。一是大力优化国内市场供给，全面提升国产商品和服务竞争力，加强自主品牌建设，改善进口商品供给，进一步完善免税业政策。如保护和发展的中华老字号品牌，建立动态管理机制，认定和培育一批文化特色浓、品牌信誉高、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华老字号品牌；完善市内免税店政策，建设一批中国特色市内免税店等。二是重点推进文旅休闲消费提质升级，丰富特色文化旅游产品，改善入境旅游与购物环境，创新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模式。如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打造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旅游购物场所；培育新型文化和旅游业态，鼓励博物馆游、科技旅游、民俗游等文化体验游，开发一批适应境内外游客需求的旅游线路、旅游目的地、旅游演艺及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创意旅游商品。三是着力建设城乡融合消费网络，结合地区发展布局打造若干区域消费中心，优化城乡商业网点布局，加强消费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快构建“智能+”消费生态体系，加快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线上线下融合等新消费模式发展，鼓励使用绿色智能产品，大力发展“互联网+社会服务”消费模式；五是持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促进重点群体增收激发消费潜力，稳定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六是全面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强化市场秩序监管，积极推进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所发文章“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二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摘编，2020年3月13日）

加强劳动教育 培养工匠精神

3月20日，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充分认识到新时代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加强劳动教育的新要求。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

《意见》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持立德树人，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学生生活实际，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创新体制机制，注重教育实效，实现知行合一，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意见》提出，要全面构建体现时代特征的劳动教育体系，把握劳动教育基本内涵，明确劳动教育总体目标，设置劳动教育课程，确定劳动教育内容要求，健全劳动素养评价制度。要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家庭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学校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社会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支持作用。要着力提升劳动教育支撑保障能力，多渠道拓展实践场所，多举措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经费投入机制，多方面强化安全保障。要从组织领导、督导检查、宣传引导三个方面切实加强劳动教育的组织实施。

在设置劳动教育课程、确定劳动教育内容要求方面，《意见》提出，职业院校以实习实训课为主要载体开展劳动教育，其中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专题教育不少于16学时；中等职业学校重点是结合专业人才培养，增强学生职业荣誉感，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培育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

（摘编自新华网，原题为“（授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2020年3月26日）

“大系”平台

推进“两大工程” 共谱历史新篇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是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的十五个重点工程之一，《中国民间工艺集成》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也是国家“十三五”重大出版工程项目。在中宣部、中国文联的领导下，中国民协秉持学术立会传统，全面组织实施。“两大工程”是中央交给中国文联、中国民协的重要任务，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们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的高度信任。

中国民协在新冠肺炎疫情依旧严峻的形势下召开网络视频推进会，号召大家“编书”“防疫”两不误，扎扎实实推进《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中国民间工艺集成》（以下简称《大系》《集成》）“两大工程”的编纂工作，争取高质量、高水平完成编纂和出版任务。2020年编纂目标：《大系》完成编纂出版40卷，进入编辑审读程序70卷；《集成》完成10卷编纂出版工作。

3月20日上午，《大系》《集成》编纂工作视频推进会顺利召开。出席本次视频会议的有“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代表，《大系》和《集成》主编代表，各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协的负责人，中国文联出版社、青岛出版社有关领导和编辑人员，中国民协分党组全体同志，“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会议由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邱运华主持。

会上，邱运华传达了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文同志的指示：第一，表达对大家前期工作的肯定及衷心的感谢；第二，团结协作，保证进度，特别强调请大家务必把这项工作放在全部工作的第一位，提高重视程度；第三，讲求质量，严格按照国家工程的标准来编纂出版。此外，邱运华同志在发言中强调，2020年是全面铺开《大系》《集成》“两大工程”编纂工作的关键之年，使命神圣，责任重大，不能被动等待，要求各地必须铺开全部门类的编纂工作，按照2025年完成的时间节点来规划。各方面要统一思想，坚决完成2020年各项编纂目标：2018年下达的任务，今年全部出版，2019

年下达的任务在今年全部进入编辑审读程序。希望各卷编委会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充分利用这一阶段作好案头文字工作，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指标。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潘鲁生就推进“两大工程”作了重要部署，并就编纂出版工作谈三点意见：

第一，深刻认识“两大工程”编纂使命，充分把握工作要求。

第二，充分总结和发扬已经取得的好经验。特别提出坚持学习，以学习为引领；充分交流，落实编纂理念；细分任务，分梯次传导部署；数据同步，建设数据库工程等有益经验需要继续发扬。

第三，全力完成目标，切实保证编纂出版质量。要适应情况变化，克服困难，不能降低标准和质量，做到稳步推进，不辱使命。在示范卷的基础上，争取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与出版社通力协作，提升编纂出版水平，提高学术资源利用率，使《大系》《集成》名副其实，做到统筹协调，理念与实践紧密衔接，充分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当代人文精神。

中国民协理论研究处处长、“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锦强针对大系出版工程的文库出版、数据库建设、社会宣传活动、民间文学普及读本四个方面的工作情况分别进行了详细介绍和总结，并对2020年《大系》编纂工作做了全面的计划和解读。此外，为了加快工作节奏和进度，做好项目衔接与跟踪，确保各个环节都能够严密紧凑并不断提速，他建议，鼓励和倡导各省一次性推出完整规划或今后5年计划，并逐年加快频率，提高效率，力争提前完成。

中国文联出版社副总编辑姚莲瑞结合《大系》示范卷的内容导向度、内容详实度、引文准确度、体例规范度、版权清晰度等五方面编辑出版工作遇到的共性问题与大家分享、交流，为今后各位专家在组稿和审稿中能规避一些问题提供参考。

《大系》和《集成》“两大工程”的编纂工作，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本次会议号召大家在紧锣密鼓的项目实施工作中，争取高质量、高水平完成编纂和出版任务，真正担当起新时代文艺事业和民间文艺工作的职责使命，谱写出民间文艺界的新篇章。

（张慧霖）

潘鲁生：齐心协力推进“两大工程”

尊敬的各位专家、民间文艺界的各位同仁：

大家好！

今天，我们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召开“两大工程”编纂工作的推进会，通过视频如同见面，在这里向大家表示问候。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脱贫奔小康的决战之年，也是响应党中央部署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中国民间工艺集成》（以下简称《大系》《集成》）的第三个年头。冬春之际，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成为世界范围内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书写出一份“疫情防控”的有力答卷。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各行各业复工复产，努力把疫情耽搁的时间、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今天，我们召集网络视频会议，就是号召大家“防疫”“编书”两不误，扎扎实实推进《大系》《集成》“两大工程”的编纂工作，争取高质量、高水平完成编纂和出版任务。

在这里，我就编纂出版工作谈三点意见：

第一个方面：深刻认识“两大工程”编纂使命，充分把握工作要求。

在这次疫情防控的过程中，我们再一次深刻感受到践行专业使命的重要性，体会到专家的敬业精神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意义。

此时此刻，我们承担的任务也很重大。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是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的十五个重点工程之一，《集成》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也是国家“十三五”重大出版工程项目。在中宣部、中国文联的领导下，中国民协秉持学术立会传统，全面组织实施。可以说，“两大工程”是党和国家交付中国文联、中国民协的重要任务，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们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的高度信任。

项目启动以来，大家只争朝夕、全力推进，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去年12月，我

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隆重推出了“大系出版工程”的首批十二卷示范成果，包含 1200 多万字、300 余幅图片，展现民间文学的历史风貌与新时代人文精神，产生了积极反响，是我国民间文学研究整理和出版发行的又一个重要标志。《集成》编纂工程也在稳步推进，第一批示范卷有广东、山东、江苏、湖南、河南五个省完成了初稿编纂工作，目前专家正在审读；浙江卷、福建卷、湖北卷、辽宁卷、吉林卷等 6 个卷本和四川卷即将提交图文初稿。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两大工程”任务，在规模上，十分宏大；在进度上，承前启后；在时间上，较为紧迫：根据整体工作安排，《大系》2018 年、2019 年规划了 130 多卷编纂计划。基本思路是：2018 年下发的任务，今年要完成出版任务；2019 年下达的任务，今年要收齐稿子、进入编辑程序。因此，今年，“大系出版工程”还要完成 40 卷编辑出版任务，同时收齐 70 卷稿件进入编辑程序。任务相对比较繁重，而且前后关联，经不起耽搁，我们要把工作计划好，落实好，早做工作部署。根据整体工作安排来看，今年，《集成》应完成第一批示范卷 10 卷编辑出版。基本思路是：今年出版 10 本示范卷，其他省市区应完成初稿阶段，如进度快的能交付尽量早交付编辑程序。按计划明年应该全部交付出版社。

可以说，“两大工程”任务繁重，一环扣一环；前年事今年交，去年事今年结，今年事今年办，不能积压欠账。由于今年的时间紧，任务重，我们要议订签署明确的工作任务，对今年及今后几年进行规划，对标对表，细化流程，精准作业。要保持政治站位和高昂斗志，做到分地区、分类别、分项目、分阶段、分步骤地推进各项事业，做到心中有数，游刃有余；做到稳打稳扎，在顶层设计上坚持服务大局、高标准、严要求；做到全国一盘棋，各省市自治区要比学赶帮超，激活分散资源，形成我们协会的合力和规模效应。

第二个方面：充分总结和发扬已经取得的好经验。

“两大工程”启动以来，中国文联铁凝主席、李屹书记十分关心项目进展，陈建文书记靠前指挥，在中国文联党组的领导下，组织保障措施不断加强，项目整体规划和实施方案越来越细致和完备。冯骥才主席和学术委员会的专家亲自把握学术导向，在编纂人员和出版社同仁的通力合作下，文本编纂原则和学术把关进一步准确和严格，编纂体例逐步科

学规范，专家学者理论指导对症实用，编辑出版思路更加清晰明确，各方协作更加顺畅高效，工作流程和环节衔接更加紧凑严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也更加规范完善，示范试点带动作用 and 辐射效果更为显著，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广泛深入。

特别是以下几点经验，我们要继续发扬：

一是坚持学习，以学习为引领。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国文联十届五次全委会会议工作部署、中国文联党组巡视整改工作要求，以及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切实锤炼担当新时代文艺事业和民间文艺工作的职责使命的系列成果，反映出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求真务实，勇于实践的思想境界和文艺追求。

二是充分交流，落实编纂理念。“两大工程”是编纂出版工程，需要理念一致，体例统一，就此要勤交流，多研讨，及时解决具有共性的问题，深入研究编纂细节，做到严谨规范，编纂扎实。在这一方面，“大系出版工程”选取了有代表性的民间文艺传承发展基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品交流活动、学术研讨活动、社会宣传活动，着力营造传承优秀民间文学的良好氛围，配合“大系出版工程”在全国范围的宣传发动。《集成》编纂也建立了定期交流、常态研讨的工作机制。2017年以来，我们在北京、青岛、南京组织召开了7次《集成》工作推进会议，赴辽宁、四川、重庆、江西、湖南、湖北、海南等20多个省区市调研、督导省卷编纂工作，及时汇总省卷编纂过程形成的经验、发现的问题，不断优化《集成》编纂大纲，修订、完善《编纂工作手册》。

三是细分任务，分梯次传导部署。各省市自治区民协、各级编委会、专家学者以及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很好地运用国家、省、市、县四级成熟的网络架构体制优势，发挥了地域分布广泛的民间文艺人才队伍优势，并层层分解任务环节与细分内容要素，分梯次传导“两大工程”编纂理念与任务，并在不断优化和完善各层级组织机构、人员配置、协作机制、示范卷成果验收等方面取得新方法、新经验、新进展。

四是数据同步，建设数据库工程。民间口头文学数据库工程已正式并入“大系出版工程”，现在已建设了20多亿字的数据规模，而且这个数字及其内容还在不断扩大和充实。数据库的介入，为“两大工程”的发展布局提供了战略平台。我们也希望未来在有条件的

情况下将四级民间文艺家协会架构填充海量信息，真正实行民间文艺数字化、网络化并成为民众的掌中宝。

第三个方面：全力完成目标，切实保证编纂出版质量。

今年的工作已经启动，各省市自治区民协及项目主持单位的执行方案、主编人选、编纂体例、经费使用、交稿时间等事项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当中，希望大家克服困难，提高效率。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我们计划中的一些启动会、推进会、研讨会、专家论证会、审稿改稿会，以及调研采风活动、艺人传习活动、业务培训活动、社会宣传推广活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等等，可能会延期和缩减。在条件允许时，也许会变得密集和扎堆儿，我们要适应情况变化，克服可能存在的困难，不能降低标准和质量，做到稳步推进，不辱使命。

关于切实保证质量，再谈几点建议：

一是充分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当代人文精神。

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要求，增强“两大工程”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积极主动适应民间文艺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转变思想观念、创新方式方法。要加强行风建设和民间文艺人才队伍培养，把巡视整改与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结合起来，进一步发挥民协在推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民间文艺事业中的引领作用，从而突出新的编纂理念，创新出版成果。

二是在示范卷的基础上，争取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两大工程”的示范卷提供了很好的实践范例，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是我们编纂工作的起点，我们要在示范卷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争取更成熟、更有分量的卷本。我们要始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两大工程”的全过程和各环节，继续做好统筹规划，精准施策，分类指导，分步实施，严格把住质量关，在示范卷的基础上编出越来越多的精致的文本和精彩的图书。

三是提高学术资源利用率，使《大系》《集成》名副其实。在人才资源上，要开放包容，聚八方人才、各行精英，特别要联系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地方专家，把工作做细致做扎

实；要使各类专家联系更紧密，协作更充分，广泛凝聚共识，形成学术合力。在内容资源上，不仅要门类齐全，内容全面有代表性，还要内涵深刻有正能量，要全面、准确、科学地再现民间文艺的风貌和真实情境与生活状态，避免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在门类和思想、风格上都做到全面翔实和充分深入。在现有编纂规划上，要强弱项，补短板，破瓶颈，充分发挥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联络、协调、服务、自律、维权等职能和作用，逐步扩大“两大工程”的接触面、辐射面、吸引力和影响力，不断释放民间文艺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在资金管理上，严格执行专项财务制度、监督管理制度等，切实做到项目安全、资金安全、廉洁安全。

四是做到统筹协调，理念与实践紧密衔接。要用好和盘活学术委员会顶层阵容及专家组的智库资源，为中青年专家学者提供更好的治学条件和更多交流机会，使他们新锐的学术思想为“两大工程”奉献更多创造性思辨成果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充分尊重地方编委会、各项目团队及民间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与付出的智慧心血，加强与他们的联系跟踪、业务对接与密切合作，吸收他们的好点子、好做法，并运用到项目设计、管理体系和实施方案中来，做到接地气，有自信，使我们的“两大工程”始终保有源头活水。在工作安排上，要组织专家组与地方编委会、各项目团队及民间艺术家一起调研，既要解决理论层面的普遍性问题，又要会诊实践领域特殊性的疑难杂症，对作品产生的历史语境与现实情境进行科学阐释与本土解读，实现一代又一代民间文艺工作者薪火相传的精神传承，将民间文艺的真材实料、真情实感、真知灼见奉献世人。

五是与出版社通力协作，提升编纂出版水平。“两大工程”是编辑出版工程，出版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前介入，全程参与。由资深编辑参与，加强策划论证、组织协调和审核编修等，做到编审认真把关，作者与编者做到齐清定稿，一丝不苟，目的是出版工程更加严谨规范。严格落实专家论证制度、进度管理制度、质量管理制度等，各分卷在正式撰写之前，对框架设计、体例规范等进行论证，从源头保证内容质量。同时，要积极吸取我国重大出版工程项目的成功经验，做好编辑出版工作的全方位规划，严格履行送审制度和重大选题备案制度，涉及民族、宗教、疆域、重要人物等内容，我们严格遵守相关出版法规和宣传纪律，执行相关送审、备案制度。同时，要在内容及版式装帧上呈现上体

现“两大工程”的编纂出版风格，后续传播也将更具创造性。

各位同仁，今天是农历“春分”，俗话说“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我们的《大系》和《集成》“两大工程”也要把握时间，扎实推进，做到不误时，勤耕耘，有收获。中国民协及团体会员、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民间文艺工作者中的党员、干部，一定要同心同德，聚精会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和最重要工作抓紧压实；要把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两大工程”积极推进，全力以赴，不辱使命。感谢大家为“两大工程”付出的辛勤劳动！今年，我们一起努力，争取不平凡成果和收获！谢谢大家！（潘鲁生）

邱运华：在中国民协“两大工程”推进视频会议上的讲话

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召开推进《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和《中国民间工艺集成》（以下简称《大系》《集成》）这“两大工程”的编纂工作视频会议，在新冠肺炎疫情依旧严峻的形势下召开推进会，体现了中国文联、中国民协对贯彻落实中央部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高度重视，也表现出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对承担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职责的高度自觉。在此，我代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学术委员会和编纂工作委员会，代表中国民协分党组，受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文同志的委托、也代表陈书记对大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今天会议有三个议程：一、“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锦强同志介绍大系编纂进展情况；二、中国文联出版社副总编辑姚莲瑞同志介绍编辑出版要求；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潘鲁生同志部署2020年“两大工程”任务。

陈建文书记因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他特意嘱咐我向大家表达三层意思：

一是衷心感谢大家前一阶段的工作。“大系出版工程”第一阶段 12 个门类示范卷编纂完成，去年 12 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公布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乃至国际民间文艺界也高度关注，文联和民协对此极为重视，投入了相当大精力，12 个示范卷的完成，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为今后的全面铺开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希望全国各地民协和编纂专家组以此为基础展开全面编纂工作。

二是团结协作，保证进度。《大系》的编纂出版工作是各地民间文艺家、专家学者、出版社各方面协作的大型工程，团结协作是工程顺利进行的保证，缺乏协作，我们的工程就会难以完成；同时，必须注意，我们的工作是有时间要求的，必须保证在限定的时期全部完成。刚才潘主席、王锦强主任都强调了工程进度，这很重要。前三年是试水，打基础，2025 年是工程进展的下限，请大家务必把“大系出版工程”放在全部工作的第一位，这是中央工程！

三是讲求质量，严格按照国家工程的标准来编纂出版。“大系出版工程”是列入中央传承工程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党中央、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全社会特别期待，学术界十分关注，前一阶段各方面工作格外谨慎，高度负责，12 个门类示范卷做了一年，部分卷本还是有瑕疵，为什么如此？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杠杠：国家工程的标准。希望大家在后续的编纂出版工程中，务必按照这一标准来开展工作。

同志们，中国民协承担的“两大工程”是中央领导特别关注的项目，使命神圣，责任重大。今年是全面铺开《大系》、《集成》“两大工程”的编纂工作的关键之年。在全国是脱贫攻坚决胜年，是庆祝建党 100 周年的关键年，今年年初又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心共同抗击疫情，取得重大进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召开“两大工程”编纂工作推进会议，全面铺开编纂工作，表达了在中央坚强领导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自信，对我们承担文化使命的高度自信。“两大工程”都是 2018 年启动，今年是第三年，《大系》2025 年要基本完成、《集成》2022 年要完成。任务很重，不能被动等待，各地必须铺开全部门类的编纂工作，按照 2025 年完成这个时间节点来规划。

各方面要统一思想，坚决完成 2020 年各项编纂指标。刚才潘主席代表文联和民协提

出来的今年编纂指标，《大系》完成编纂出版 40 卷，进入编辑审读程序 70 卷，《集成》完成 10 卷编纂出版工作，归结起来也就是：2018 年下达的任务，今年全部出版，2019 年下达的任务，今年全部进入编辑审读程序。我完全赞同，这是大家共同研究的结果，也是大疫之年的大举措，使命光荣，任务艰巨，举措要得力。下面中国民协和全国各地民协要高度协调，细化指标，制定可行办法，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充分利用这一阶段作好案头文字工作，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指标。

衷心祝愿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身体健康，编纂顺利！

衷心希望我们民间文艺界以出色成果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

谢谢大家！

（邱运华）

王锦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纂工作进展及 2020 年度工作计划

各位同仁、专家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的实施工作，今年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大系出版工程”自启动之日起，严格按照《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实施方案》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组织保障等核心内容及中宣部相关要求、财政部文化项目有关规定，统筹规划，统一认识，合理布局，分步实施，全力推进《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文库出版、“大系”基础资源数据库建设、各类别民间文学系列推广活动、民间文学经典读物及系列普及读本编写等“大系出版工程”重点任务。目前，“大系出版工程”均已取得阶段性工作成果，上述重点项目全部进入攻坚阶段。下面受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介绍编纂工作阶段性进展，以及 2020 年工作计划。

一、阶段性工作进展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磋商、项目申报与研讨，“大系出版工程”实施方案于2018年正式通过中宣部论证与批复。中央财政配套了“大系出版工程”专项资金用于“大系”各分卷编纂出版、少数民族语言民间文学翻译、数据库和网站建设、开展宣传推广活动等。今年及未来五年的经费预算，也已于2019年经过财政部预算评估审定并且明确。

（一）“大系”文库建设

“大系出版工程”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本着学术队伍结构合理、组织体系完备、基础资源雄厚、工作积极主动等综合条件较好者优先的原则，结合各省申报编纂的意愿，与各省、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协沟通磋商并确定合计55个示范试点编纂任务（实际安排了61卷）。中国文联、中国民协向各省文联、民协印发了《关于实施“大系出版工程”的通知》。中国民协还及时制订并印发了《关于办理“大系出版工程”省级示范卷编纂工作经费与合作协议的通知》，随附《“大系出版工程”2018年省级示范卷编纂工作经费使用办法》及双方、三方合作协议，与承担示范卷编纂任务的省份签订合作协议、落实拨付大系出版工程委托费，用于各编委会开展调研、编纂等工作。与此同时，“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协调、组织各编辑专家组，按照《通知》中对示范卷编纂工作的部署，两年来分赴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召开示范卷编纂工作启动会、推动会、座谈会、研讨会、审稿会、报告会、专题讲座、培训活动三十余次，与各分卷编委会建立联系并进行业务对接，研究并讨论各类别卷本的编纂原则、体例、程序及要点。

2019年，“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部署了79卷编纂任务（其中有几项是2018未履行相关协议顺延过来的）。去年，我们制订并发布了《“大系”编纂工作规范及实施办法》《“大系”授权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流程和相关职责》《“大系”办公室工作分工》《“大系出版工程”相关简称使用规范》《关于“大系”部分卷本办理重大选题报备的通知》等等，以进一步完善“大系出版工程”编纂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2018年、2019年两年，共部署了140卷编纂任务。截至2020年3月上旬，除了已出版的12个示范卷本，其中，有107个卷本分别处于材料汇总、图文合成、专家组审读、返回补充修改、学术委员会复审、再次返回修改、编辑加工等环节，另有11个项目未有

实质性的进展。

（二）“大系”数据库建设

2018年完成手抄本、油印本、复印本296种68594页（包括TIFF、PDF、TXT、生僻字JPG，下同），数据库一期工程资料4905册、《亚鲁王》全册、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资料102册，这部分电子文本分别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提供存储U盘；2019年完成数据库基础资料图书8348本的电子清单并编码造册，江苏省民协7606页手抄本、油印本资料数据处理，数据库第二期已加工9723册1842981页；完成203667页资料的整理、精益扫描-300DPI，这些资料的图形处理及图像全检分别完成110909页、65702页，尚有一半工作仍在推进当中。

（三）各类民间文学系列推广活动

为更好地推动新时代民间文学保护和传承创新实践，我们选取了一些传承有序、特色鲜明、群众基础良好的民间文艺之乡和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品表演交流活动、学术研讨活动、社会宣传活动，积极为新时代民间文艺培根固魂。如2018年的“大禹神话与口头传说”学术研讨会，中国青海《格萨尔》史诗系列活动，中国秃尾巴老李传说学术研讨会，全国胡仁乌力格尔大会，全国民间情歌大会暨中国颀项文化研讨会，中国壮族歌谣会，中国江南民间小戏交流会；2019年的中国北方民间说唱交流大会，中国·吕家河民歌会，等等。上述活动与累积形成的成果视听专辑与调研文集《史面与诗面——青海〈格萨尔〉调研文集》《语面与书面——乌力格尔调研文集》《神面与人面——中国颀项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假面与真面——江南民间小戏调研文集》也业已出版或即将出版。

这些形式多样的社会宣传推广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其主要体现在：一是落实了“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和传播工作计划和部署；二是充分展示了我国民间文艺的多样化传承现状，为全社会了解、关注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了主流平台，扩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和“大系出版工程”的社会影响；三是推动与促进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履行文化遗产保护主体责任的落实与担当；最重要的是，提高了基层群众的参与度，营造出了热爱、传承优秀民间文学的良好氛围。

（四）民间文学经典读物及系列普及读本编写

为推进中国民间文学代表形式及经典作品、优秀传承人表演过程的视听化作品、读物和衍生产品的开发与创作、推广与传播，《“大系”普及读本（大众版）》将精选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等门类题材，首批推出 10 种普及读物。该丛书于 2019 年底开始组织编写。

二、2020 年的工作任务

（一）“大系”编纂出版工作

按照“大系”实施办法及相关程序，尚有一些省份未完成前两年的双方或三方协议（盖章）、提供回执、出具发票或有财务效力的收据、主编备案等方面的工作事项或契约环节，需在本年度尽快补齐。按照“大系出版工程”实施方案及项目计划，2018 年列编卷本今年必须全部出齐；2019 年在编卷本今年至少要完成并提交初稿，并争取有三分之一出版或达到“齐清定”的出版要求；2020 年要严格履行协议，实施项目要有切实启动和动态进展显示与呈报。对此，我们要加快工作节奏和进度，做好项目衔接与跟踪，确保各个环节都能够严密紧凑并不断提速。从即日起，亟需尽快落实 2020 年工作计划，全面启动各体裁卷本的编纂工作。各省民协或编委会在接到报送实施项目通知后，由各省民协先期自主申报本省编纂计划，经“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工作委员会和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统筹平衡与调配后签约。同时，要鼓励和倡导各省一次性推出完整规划或今后 5 年计划，并逐年加快频率，提高效率，力争提前完成。任何工程都要有一个确定的工期。倘若所有省份都按 8 年时间（已过去了两年，剩下不到 6 年）规划，要按期完工，那是很难做到的，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所以，我们既要立足于在 2018、2019 年的工作基础上，为 2020 年豪迈开航，推进“大系出版工程”在各省区市的落实，尤其是西藏自治区、海南省、贵州省、北京市等省份，要尽快搭建强有力工作平台，做出实质性动作。2020 年，除了完成 49 卷“大系”出版任务，还要新开工 70 卷作业题量。

（二）基础资料数据库及网站建设

2020 年计划推进并逐步完成三项数据库建设项目。

第一，执行完成 2019 年延续项目合同，执行完成陕西省艺术研究院第一批 76000 页手抄本、油印本、复印本、铅印本资料数据及第二批 7 万页手抄本资料数据、第三批 73727 页手抄本资料数据的数字化加工及成品格式转换生成，做好第二期数据库成品系列格式的专家把关、成果验收、质检抽查及数字化产品维护、应用管理等事项。

第二，根据财政部批复划拨资金额度，精打细算，量入为出。2020 年拟在专家论证的基础上尽可能扩充数据库资料数据，并着手组建应用网站平台。

民间文学资料数据化项目，包括建设健全“大系”数据库系统，录入、存储民间文学数字资料、视频音频资料，同期加工文本知识（分类、校对、编号），配套纸质资料库档案建设；经调研论证后实施甘肃宝卷、江苏宝卷数字化项目、皮影入库项目及与有关省份合作开展“大系”资料本的电子扫描及文字信息处理。

第三，加强数据库应用型网站的前期开发、设备与人员配置、日常维护管理，并通过编辑平台、应用平台和发布平台建设，逐步实现民间文学数字出版和网络传播。

另外，图书出版、招标议标、单一来源采购、会议论坛等项目工作，继续在中国文联、财政部的指导及“大系出版工程”法律事务团队的配合下，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执行，并积极稳妥推进，确保资金使用准确安全与绩效管理考核合格。

（三）“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

社会宣传推广项目活动有效提高了“大系出版工程”的社会影响力，是传承、发展、展示、传播、推广优秀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化的有效平台与合理利用空间。

2020 年重要会议有：“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大系出版工程”系列成果发布会、“大系出版工程”成果应用与研究学术研讨会等；主要活动有：民歌传唱与谜语猜想——2020 年民歌、谜语传承与发展交流会，传统“二人台”与民间“二人转”——民间小戏研究与利用交流会，大运河叙事与南北民间传说调研座谈会等。

（四）民间文学经典读物系列普及读本

出版第一辑 10 种读物，推出第二辑 10—20 种，确定第三辑编选种类、出版数量、作品名录及编写作者队伍。积极拓展大众读本的电子产品销售和网络传播渠道。

谢谢大家！

（王锦强）

侗族童谣文化遗产亟需抢救和保护

李生柱¹

在黔湘桂三省（区）毗邻地带，世代居住着勤劳智慧的侗家儿女，他们能歌善舞，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间文学，享有“诗的家乡，歌的海洋”之美誉。其中，童谣是一颗晶莹的明珠，很早便引起了学者的关注。1942年，大夏大学的著名人类学家陈国钧在《贵州苗夷歌谣》中收录了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数首侗家童谣；1961年，贵州民间文学工作组编《民间文学资料》第30集《侗族歌谣集》也收集了近十首童谣；2012年，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办公室在此基础上编写了《侗族童谣》，标志着侗族童谣的搜集整理工作步入新的阶段。

尽管老一辈学者和文化工作者们对侗族童谣的搜集与整理工作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学术理念等因素的制约，过去的工作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譬如，没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忠实记录，在文本整理过程中存在过度意译、删减、改写等不当操作，从而丢失了童谣鲜活的口头性特征；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只记词不记乐谱，因而丧失了童谣传唱形貌结构的整理性，等等。这些都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更为严重的是，笔者近日在参加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侗族村寨社会文化田野调查”项目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侗族地区传统童谣的传承正在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困境，已处于濒临失传的边缘，亟需进行抢救保护。

所谓童谣，亦称“儿歌”，是一种古老的韵话体口头短歌，由大人拟作或儿童创编，在社会中长期流传、广泛传诵。侗族童谣用侗语世代传唱，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淳朴童稚的思维、率真自然的形式、和谐优美的音律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儿童的成长，是侗家人传习民族语言、实施民族德育、保存历史记忆、实现民族认同的“法宝”。据锦屏县瑶白侗寨

¹李生柱，山东大学民俗学博士，贵州师范学院中国乡土社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转自微信公众号“民族文学”，原文发表于《贵州民族报》2015-02-06。

宋义昌老人介绍，“过去娱乐节目很少，养育孩子全靠儿歌，一首首好听的歌谣教会了他们生活常识、文明礼貌与文化知识，但是现在基本上很少有人再用童谣哄小孩子了。”该村45岁的滚兴西女士也一脸无奈地告诉我们：“现在的侗族小孩都说带有浓重方音的普通话，看动画片，喜洋洋、光头强之类的，没有人再唱儿歌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也都不会了，全忘记了，只有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才懂得一些。”

面对侗族童谣的消逝，锦屏县彦洞乡文化站主任张兰姣女士颇感痛心，她认为由于青壮年常年在外打工，母语能力衰退，他们已经不会唱儿歌，也不再用优美动听的童谣儿歌去教育年幼的子女了，这是侗族传统文化的重大损失，政府和学者应该予以关注。

从锦屏高坝古侗寨走出来的著名侗族语言学家、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石林先生忧心忡忡地表示，“侗语最原始鲜活的元素往往储藏在歌谣中，童谣可以说是侗语的‘天然’存储器，它的快速消亡直接导致了侗语的许多基本词汇、语义内容与句式的失传，将会造成连锁反应，使侗族的语言和包括传统音乐在内的其他各种文化遗产都连带进入日益濒危的境地。”

据笔者调查，侗族童谣濒危的原因是多样的，但外出打工潮造成的民族村寨日益空心化和民族文化遗产的代际断层无疑是最突出的因素。当今的侗族地区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手机、电视等新媒介在村寨中日渐普及，由于语言文化保护措施跟不上时代的剧变，国家提供的双语教学也没有得到有效开展，使侗族儿童在学普通话的同时放弃了母语学习，“结果普通话没学好，母语却丢失了”的尴尬两难状况成了普遍现象。在此背景下，千篇一律的动画片和网络电子游戏逐渐取代丰富多彩的童谣，成为儿童主要的娱乐方式。随着年轻一代不再传唱，童谣传承的链条基本断裂，只能在老年人的记忆中寻觅到支离破碎的片段，一旦这批年老的传承人离世，童谣便随之永久性失传，成为绝唱。因此，对侗族童谣的抢救、整理与研究，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它既是传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必须，也是保护民族语言、守护民族精神家园之紧急要务。

在谈到抢救保护侗族传统童谣的重要意义时，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贵州师范学院教授龙宇晓指出：“童谣里蕴藏着十分

丰富的传统知识内涵和民族教育资源，对于儿童的早期智力开发、良好性格的培育、人伦关系处理能力的形成，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民间俗语常说‘从小看大’、‘国家大业，从孩子抓起’，瑞士著名教育学家皮亚杰的儿童发展理论也告诉我们，儿童早期所受的传统熏陶和智力开发决定他们今后一生的性情和能力。因此，童谣的抢救和研究看似事小，其实是关乎民族和国家未来之举。”

抢救保护侗族童谣，首先需要运用规范的民俗学田野作业方法对仍然存活的童谣进行抢救性搜集、整理，运用录像、录音、照相等方式完整记录展演现场，不仅记词更要记谱，尽可能地还原童谣传唱的原生态形貌。其次还要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全方位、多维度地对它进行综合性研究，从学理上阐述其本质属性、民族特色与地域色彩，以研究成果来反哺和推动抢救保护工作。这些工作的有效开展都离不开政府有关部门对童谣文化遗产的宣传和重视，更离不开当地民众的能动参与和积极支持，只有唤起侗家儿女对童谣的热爱和“文化自觉”，才能真正使民间文化的“瑰宝”——童谣常留人间。

当然，要实现传统童谣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传承，我们的工作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抢救整理和研究上。“活态传承的保护模式才是最有效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保护。我们应该在全面而系统地进行抢救整理的基础上，选出其中的精品来开发乡土幼儿教育读本和新媒介幼教资源，让优秀的传统童谣进入课堂，并以与时俱进的新形式重返到侗寨家庭教育中，一定要使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大业中充分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龙宇晓教授如是说。

往事历历如昨日 哀思念念悼虎彬——写在尹虎彬 老师逝世“头七”之际

齐易¹

编者按：尹虎彬是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代

¹齐易，河北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表性著作有《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专著）、《河北民间后土地祇崇拜》（专著）、《故事的歌手》（译著）和论文《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三十年》《史诗观念与史诗研究范式转移》《口头诗学与民族志》《传承论的民间信仰研究》《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等。鉴于尹虎彬先生在民间文学领域的突出成就，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特请他出任民间长诗组组长，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编纂提供学术指导。自工程实施伊始，尹虎彬先生就承担了制定长诗编纂原则、编纂规范、编纂细则及编纂体例，确定内容分类和分卷结构；组织审读稿件，并对民间文学编纂成果进行验收、评估审核、学术鉴定，提出意见与建议等任务，并且带病坚持工作，为大系出版工程作出了贡献。3月13日，惊闻尹先生故去的噩耗，特此辑录齐易教授的悼念文章及尹虎彬先生的一篇学术论文，以表追思。

疫情爆发闭门宅家期间，惊闻尹虎彬老师于3月13日上午10时26分因病去世。噩耗传来如同霹雳，让人有点不能相信，他比我还小四岁啊，一向乐观开朗、未说话先露笑脸的尹老弟怎么就提前走了呢？

与最早在朋友圈里发布消息的社科院民文所的姚慧老师联系，得知尹老师大约在半年前就已经查出疾患住院治疗了。猛然想起曾经的一件事情：2019年10月12日我陪河北省涞水县南高洛村“音乐会”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演出，这是尹虎彬老师非常熟悉的一个乐社，民间乐师们想念尹老师，说能不能请他来看演出？我随即打电话给尹老师，他没有接，给他发微信过去，随即他就回了过来：“非常想去看，但是现在不方便，以后再联系。”我当时也没有把这个回复太当回事，给民间乐师们把尹老师的消息传达了，说他可能在忙什么事情，想来来不了。现在回忆起来，那时他恐怕是在医院里住院，如果知道实情，我们怎么也要去看望一下他啊。

我与尹虎彬老师的交往，也始于对南高洛村音乐会的共同关注。

从2001年开始，尹虎彬老师对以河北省易县后山庙这个道观为中心的民俗和民间信仰文化产生了兴趣，开始了《河北民间后土地祇崇拜》这一课题的研究。那正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钟敬文、刘魁立先生攻读民俗学博士期间，他的研究受到了钟敬文、刘魁立、

董晓萍等教授的支持和肯定，从此他开始了对易县后山马头村、涑水县南高洛村长达十几年之久的驻村考察。他还以这两个村落为中心，遍访了周边的许多村落，了解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给他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田野基础。

2001年8月中旬，他拿着董晓萍教授给南高洛村“音乐会”乐师写的介绍信到了这个乐社，由此开始了对这个乐社的考察工作。在后来的十几年中，每年的元宵节前后他都要到南高洛村来住上几天，吃住在单伶乐师的家中，在与一个个朴实的传统文化局内人拉拉杂杂的闲聊中，了解和积累着做课题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南高洛村“音乐会”每年正月十三到十六日的春节祈祥仪式，更是他考察的重点内容，他总是手拿一个小笔记本，随时记录下仪式过程、自己的感悟等。

当时河北大学的音乐学研究生们，有每年元宵节前后到南高洛村民俗仪式现场进行约一周考察学习的“固定课程”，而每年来村里总能遇到正在这里考察的尹虎彬老师。尹老师对这些学生们从来不摆大学者的架子，总是随时随地地给学生们传授些田野考察的经验，并身体力行地为学生们做出表率。学生们对这位社科院的学者也非常敬重，常常围着他讨教各种问题，尹老师也总是耐心地与学生们交流，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看似有些“小儿科”的问题。

我每年都要带学生去南高洛村考察，与尹老师是在考察中认识的。在此之前相互都看过对方的一些研究文章，因此在考察现场一见面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在近20年的交往中，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在考察现场见面，平时也常常互通邮件，交流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在研究工作上也常常咨询并参考对方的意见。

我的《是保护？还是破坏？——对河北省范庄“龙牌会”现象的思考》这篇文章，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俗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关注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范庄“龙牌会”本是由道士打醮发展而来的一种包含当地百姓良好意愿的民间信仰，在多种功利性因素的影响下，被解释为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龙文化”，以主流文化的需要而改变了它本来的文化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初目的是为了维护文化生态的多样性，而对龙牌会的改造却与这种原初目的背道而驰。因为文章说了些比较尖锐的真话，所以有的刊物不敢登。我是搞音乐学的，对民俗学比较陌生，也怕文章的内容可能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就在2013

年的年初把文章寄给尹虎彬老师征求意见。他看到稿子后，大赞文章写出了自己早就想说的话，立即就把稿子推荐给了《民间文化论坛》，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了该刊 2013 年第 2 期上。

还有一年春节期间，在结束了对南高洛村的考察后，尹老师搭我开的车从村里出来，赶到定兴县的 107 国道上坐去往北京的长途汽车回家。平时说话比较谨慎的他，遇到和知底的朋友在一起时，就把憋在心里的实话全抖出来了，我们一路海阔天空地聊着。他认为现在的非遗保护工作出现了偏差，南高洛村“音乐会”这样的民间组织，首先是为民间信仰、民俗而存在的，可现在却单独把音乐的内容拿出来进行保护，而对与主流文化不同的民间信仰却视而不见，岂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有申报非遗过程中的作假问题，他说为了政绩，现在有的人弄出一些假东西来进行申遗，竟然还申报成功了，并例举了他在易县、涞水的长期考察中看到的一些情况；对于河北省内有人把南高洛村“音乐会”演奏的音乐说成是“黄帝祭天，后人祭祀黄帝”的音乐，他嗤之以鼻，说许多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学问，凭常识就能够判断出真伪，高洛村是一个明代才出现的移民村，这个村落的音乐与黄帝何干？

尹虎彬对南高洛村“音乐会”的《后土皇帝宝卷》有深入的研究。这部宝卷主要讲述了一个叫张生香的女子（即涞水、易县及周边地区百姓颇为信奉的民间神“后山奶奶”）修行、成神与做善事普度众生的故事，中间还穿插了“刘秀走国”被张生香所救的情节。这部至今仍然能够活态唱念的宝卷，是 1943 年由新城县（今高碑店市）南虎贲驿村的信士马献图所抄。2015 年我考察南虎贲驿村的南乐会时，专门访问了马献图的女儿、84 岁的马淑媛老大娘。我把访到马献图后人的情况通过微信告诉了尹虎彬老师，还发去了与马大娘一起拍的合影照片，尹老师在问了一些情况后，说他也想找机会去宝卷抄录者的家乡探访，让我先给马淑媛老大娘垫一个话，可他的这个愿望最后也没有实现。

2015 年春节，我带河北大学文科研究中心的一个团队到南、北高洛两个村子去进行传统音乐和民间仪式活动的考察摄录工作，尹虎彬老师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张振涛、林晨等老师也都前来助阵。在摄录南高洛村“音乐会”的《后土皇帝宝卷》韵念演唱时，尹虎彬老师根据他多年对这个民间文本的研究心得，出境进行了详实的解说介绍，为这个摄录

版本留下了珍贵的学术性资料。在正月十五这一天，我们考察完南、北高洛两村的仪式活动结束后，尹老师和我、张振涛，以及涑水县文化局原局长刘阜等四位长期关注高洛村“音乐会”的老朋友举行了一次座谈，回顾了高洛村“音乐会”乃至整个冀中笙管乐这一民间乐种从默默无闻到名扬天下的历史。尹虎彬老师谈到了民俗学界对高洛村民间信仰及《后土宝卷》文本的研究，田野考察的学术伦理等问题，这些话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者的田野调查等工作都具有启示意义。这次座谈的笔录，后来刊载在了《人民音乐》2015年的第6期上。

2015年至2019年以我为召集人的“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联合考察团队”在冀中地区连续的考察摄录研究工作，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尹虎彬老师也在时时刻刻关注着我们这个团队的行动，常常在手机上观看我们考察时的工作现场直播，并给予热情的鼓励。我们在考察时遇到了许多与明清时期的弘阳教有历史联系的民间文化组织，还发现了一些弘阳教遗留的经卷唱本，当我把这个情况向尹虎彬老师通报后，尹老师非常感兴趣，认为可以把明清时期弘阳教的当代文化遗存作为研究民间宗教的一个重要选题。他说一个历史悠久的民间宗教历经几百年的流传，至今在民间还有文化遗存，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事情，要善待这些民间组织，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才是当代社会应该有的一个良性状态。他还嘱咐我：在保护民间组织、保护传统文化方面要长脑子，对于一些我们不太了解其为人的当地政府领导，最好不要把这件事情说破，以防有极左思想的人找借口肆意毁灭传统文化。我听了他的话以后非常感动，这位老弟是一个真正对传统文化有深厚感情的人，如果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有他这样的胸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就真正有了希望。

2019年7月9日，“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联合考察团队”的研究成果之一《雄安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录》要由出版社申报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需要两名有社会影响的专家的推荐书，我又想到了尹虎彬老师。联系上他以后，回复说他们正集中在密云区进行“不忘初心”的教育学习活动，我中午把请他帮忙的意思说了，他晚上就发来了推荐书，还抱歉地说：“本来想制作一个好的推荐书，可惜是在密云，手头不方便。”他授权我可以对他传来的文本根据需要进行修改，并预祝申报国家出版基金的工作顺利成功。

与尹虎彬老师交往的一件件往事犹在昨日，却突然传来了他去世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在悲痛之余，我把他工作单位的讣告转发在了微信朋友圈里，还发了几张我们在一起进行田野考察工作的合影照片。朋友们看到他去世的消息后，纷纷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震惊和哀悼的情感。他在南高洛村考察时住宿的房东、老乐师单伶说：“这消息如雷轰顶，一时不知所措，悲痛之极！尹虎彬是老师也是好友，十多年来每到元宵节必到村里对传统文化细致研究，秉灯伏案，兢兢业业……”在尹老师考察过的易县后山庙，当地的道士们为了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特意举行了道教烧送超度表文的仪式，有一位叫刘伟强的道士把仪式现场的照片发给了我。他说：“愿尹老师一路走好！愿太乙天尊接引尹老师青华长乐界！”作为一个研究民俗学的学者，在他曾经考察过的地方，民间文化局内人能够在他去世后自发地以自己的方式追念他，这也是一种身后的哀荣。

尹虎彬老师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去世，连出席追悼会寄托对他的哀思都成了难以办到的事情。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学术贡献、他的与人为善都将永存于大家的心中。

安息吧虎彬老弟，愿你一路走好！

· 论文推介 ·

◆ 《口头诗学的本文概念》

【作者】尹虎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摘要】

一、“表演中的创作”与口头诗歌的本文

帕里和洛德关于口头诗的调查和研究，可以说是“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的先驱。表演涉及表演者和观众，正是二者的相互作用才产生了本文；本文的概念来自于“表演中的创作”（Compostion in Performance）的概念。本文的权威性是由从表演到表演的稳定性程度决定的。由此亦可看出，史诗大于其人物的故事，它同时也是关于其听众的故事。洛德认为，对口头诗人来说，创作的那一刻就是表演。创作和表演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洛德从田野工作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史诗演唱者的每一次吟诵都是一种再创作，

而且他们是以大量的传统的程式和主题（formulas and themes）来进行这种再创作。表演对口头诗歌的核心地位是很明显的。只有在表演的层面上人们才可能理解口头史诗歌与书面叙事诗的区别。口头创作并不等于“自由的即兴创作”，这个词必须在特定的口述的传统的文体的限定之下加以修正。口耳相传并非固定本文的传递。在口头史诗的运作过程中，口头学歌、口头创作、口头演唱和口头传递，所有这些话说的其实是一回事，它们是重合在一起的，它们是同一过程中处于变化的不同过程中处于变化的不同层面。口头传统诗歌最鲜明的特点是它的可变性或不确定性。变异和稳定是口述传统过程的两个要素。变异并非指随意的改变，对某种固定的原始本文的改变，或由于记忆上的原因。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变异，它的根本原因是保持传统的一贯性的努力。

口头诗学表演中的创作意义上的本文代表了真正意义上的口头诗歌。荷马史诗属于口述本文(oral dictated text)，这是最接近实际表演的本文。但两者还是有差别的。即兴的口头演唱是自然的创作过程，一旦为记录而口述则会损害史诗诗行的节奏、文体。口述本文永远不可能与表演中的创作的本文相等同。歌手的演唱前后诗行的韵律结构之影响，这种结构会被口述行为所破坏。因此，书面本文(written text)，它是由歌词组成的。这是一种特殊表演的记录，一种在非同寻常的环境下的指令性的表演，对于这种书面本文，口头诗人视其为传统的瞬间的记录。把荷马视为希腊史诗的创始人，这便忽略了口述传统的创作与表演的力量，忽略了共时与历时的分析。其实，远在书面文字出现之前，口头诗歌的艺术便已经很成熟。对一位真正的口头诗人而言，并不需要书面文本，不需要用它来作为记忆之手段，将史诗记录下来的动机，也并非来自歌手。植根于口述传统的歌手，不可能被阅读和书写所吸引，仍然会以口头方式进行创作。

当一种传统被印刷的歌本所侵入时，可以出现两种情况：假如将印出来的文本读给一位卓越的口头诗人，其作用便等于这位诗人聆听另一位歌手的演唱。当歌手以为歌应该按照歌本的方式呈现给读者时，那么歌本便会腐蚀传统。易变性恰恰是口头传统诗歌的生命。这种易变性存在的条件是在歌手和传统之间没有固定本文的干预；一旦一次演唱成为特指的歌，那么多元的传统文化源泉就会被切断。那些接受了固定本文观念的歌手，已然脱离了口头传统的过程。他们是复制者而非再创作者。固定本文概念之流行是口头社会过渡到

书面社会的一个方面。

二、本文化：口述传统的历时过程

为研究演唱中的口头诗歌，共时性的分析是需要的；当研究进入传统深层的组织原则时，即文化的持续性现实时，历时的分析也是必需的。纳吉从帕里、洛德“表演中的创作”这一比较的事实出发，加进希腊传统内部的证据，提出一种关于荷马史诗发展的假定的模式，这一发展模式要求不是两个而是三个相互影响的方面：创作、表演、流布。在纳吉的演化模式中，特定时代背景是泛雅典赛会这样的场合，这是由法律规定，是季节性反复出现的荷马史诗的演唱。泛雅典赛会的功能是聚集不同的听众，同时又将统一的传统扩散四周。纳吉根据考古学的证据，指出“泛希腊主义”在公元前八世纪以后在古希腊是很显著的。此概念可以作为一种有助于解释荷马史诗特性的阐释学的模式。一定传统中的创作，都有一种机会在或宽或窄的社会框架的变化幅度上被表演。流布越广，史诗再创作的机会就越小。因此，最大限度的流布接受，必然引起最大限度的与规范的统一版本相一致的限定。

因此，本文定型(textification)或曰本文化(textualization)可以视为一个过程。在那里每一次表演中的创作，都在流布过程中逐渐地减弱变异的可能性。这里要附带的条件是，我们是在口头诗学的形态学意义上理解“本文”的。一个活形态的口头史诗传统，以其长期的演进显示出史诗的完整性、统一性。这一切均来自于史诗创作、表演、流布的相互作用，这一切都是一个演进过程。这一事实，加之《伊利亚特》《奥德赛》作为一种本文的例证，指明了荷马史诗形成过程中的演进模式。荷马史诗进化模式在持续两个世纪的稳定时期后达到顶点。荷马史诗本文定型可以视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只有当本文最终被书面记录下来时，本文定型(textfixation)才成为一个事件。在没有书面本文的情形下，可能有本文性(textualixation)或本文化(textualization)。荷马史诗传统为这种本文化提供了例证：在创作、表演和流布的进化过程中，荷马史诗传统逐渐削弱了易变性，再创作的模式日趋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向前发展，最终达到相对稳定的阶段。这一阶段被称为“史诗吟诵者”的时代。就荷马史诗演化模式的概念而言，史诗吟诵者是一种进化媒体的体现者，这种进化的媒体持续地随时间推移将越来越多地限制加进表演中的再创作的过程中，史诗吟诵者将遥远的荷马与荷马史诗在历史阶段中的当代表演联系起

来。在柏拉图关于荷马及其后继者的描绘中，诗歌创作的这种磁化般的吸引力量，随着一代代后继的表演者而渐次衰弱。

将口头史诗的创作记录成文本并不意味着书写是史诗本文创作的先决条件。书写可以产生出本文，即书面本文，它所包含的权威性与实际的表演是相互平行的。即使在书面本文成为正规形式的时代，口头传统仍然可以保持其表演的权威性，此时由口头传统生发出来的书面本文，仍然可以继续享有表演中的再创作这样一种地位。在这一后期时代，书面本文与口述传统并存，这时，关于书面本文的概念，甚至成为表演中的再创作这一权威的原始隐喻。

三、结语

帕里、洛德在创立口头诗歌的学说中，选择了语言和本文作为主要的经验的现实。他们作为古典学者主要依靠的是语言学和人类学思想与方法；口头诗歌与古典文学领域适宜于对传统的实证性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众多领域的专家在形形色色的社会里调查的材料，陆续地被运用到对荷马史诗的对比研究中，其中东欧和南斯拉夫史诗传统尤显重要。这些大量的对比的论证材料，归根结蒂要解决的问题却只有一个：关于口头诗歌中史诗的本质特点，大而言之，口头诗歌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直接地就是我们中国史诗研究者所要研究的问题呢？

【刊载】《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3期

◆《春天的喜神：礼县西和春官说春唱词的价值取向》

【作者】郭昭第（天水师范学院教授）

【摘要】人们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诞生地可能有多种说法，似乎没有一种说法有确凿的证据。礼县西和春官说春唱词可能并不能说明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至少表明礼县西和一带民间十分精通二十四节气，且由此形成一种独特的春官说春唱词，并彰显出丰富的价值取向。如果说涉及七十二行的行业春和婚丧嫁娶的习俗春彰显出不择贫富、平等普化这一春官说春唱词的价值取向的话，那么关涉一年四季乃至二十四节气歌，更表彰了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及其蕴含的不择贫富、平等普化价值取向的张扬，以及生产

和生活内容的变化。春官说春唱词只是一种填补家用的手段，不可能成为发家致富的工具，甚或是中国陇东南农村地区民间伦理道德乃至社会良知的传播乃至传承媒介。遗憾的是这一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媒介乃至体系正在面临诸多挑战。

在甘肃礼县西和南部流行一种民间行游诗人，俗称春官，也叫说春人。他们往往一人或两人一组每逢岁末年初立春前后走村串巷，发送一些用木板自行印制的春帖，内容包括二十四节气及来年雨水、五谷家畜、流年运势、日常禁忌之类，且往往出口成章，即兴赋诗，说一些祝福送喜之类的喜话，并配以简单曲调，形成一种别具一格的唱词。这些春官或说春人都是贫困地区的农民，不过是借助送春说唱这一更为高雅的形式行乞，但传达的是“不择贫富、平等普化”智慧精神。

遍布礼县西和南部一带的春官们深谙行行出状元的古训，对诸如木匠、铁匠、画匠、石匠、瓦匠等不同行业乃至三教九流等而视之，倍加赞赏。不仅对各行各业的表示祝福，而且对其精湛技艺大加赞美。在古老中国，也许教育并不像今天这样普及，春官们无意识充当了文化乃至智慧启蒙者的角色。这一角色在过去没有大众传媒的时代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也许当今社会存在的文化乃至智慧缺钙症，可能与大众传媒的功利化、浅表化、庸俗化，以及诸如春官说春唱词之类传统启蒙方式逐渐衰落甚或消失有关。对各行各业能工巧匠不择富贵贱，一例赞美的平等普化倾向，所彰显出的圆融智慧，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最高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圣人人格理想的集中体现。正是他们行游各地吃百家饭、住百家屋的生活实践，使其更有机会体悟甚或证悟这种最高智慧和圣人理想。

生活质量虽然基于物质条件和生活待遇，更重要的源于人们的心态，如果用富于诗意的眼光看待生活，即使艰辛而且痛苦的生活也可能充满自由幸福的体验。这可能是春官说春唱词将各行各业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予以诗意化、美学化处理的根本原因。

春官们对生命乃至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成败得失的达观自如，则主要基于其生活的艰辛和生命的苦痛。比如春官们在丧事中的唱词，对亡者免不了一死现状的直接认可，及对生者守持孝道必获荣华富贵的深信不疑，自然会起到抚慰亡者、警示生者的作用。在诸如“世间好事忠和孝，天下良谋读与耕。堂上父母要孝敬，敬孝胜过敬佛神”的之类抚慰和警示中，显然多了几分世俗社会的人情味，也避免了某些宗教的自私自利和冷酷无情。

如果说遭遇丧事不回避本身便彰显出对生与死无所执著、平等普化的智慧，那么对亡者乃至生者给予孝道的宽慰和祝福，更使这种平等普化的智慧得到强化和张扬。

礼县、西和南部的春官们的说春唱词，还对一年四季乃至二十四节气歌有所歌咏。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没有文化的春官们有着许多文人墨客所没有的圆融智慧。对他们来说，一年四季的更替和二十四节气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生活情调的变化，更不预示着叙事结构的变化，只是标志着生产乃至生活内容的变化。其实真正能通达看待时节和节气变化，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恰恰是农民，以及他们中永远保持乐观且不避春夏秋冬、成败得失，一例将幸福和快乐寄托于他人的春官。他们才是春天的真正使者、幸福的真正使者，甚至春天的真正喜神。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紧跟节气不误农，不是所谓哀婉春天的易逝，秋天的悲哀。这才是他们真正体悟天地自然之大道的体现。

春官说春唱词所彰显的智慧更在于对生活平淡无奇和生命无足轻重，乃至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冷静认识。他们崇尚伟人，但不夸大伟人的价值和意义。在他们看来，所谓显赫一时的伟人，对未来的真实影响，仅限于伦理道德层面，而不是历史层面，所谓历史层面不过是不同时期更替的一个休止符而已。如《九九春》：一九头，入寒冬，纣王驾坐朝歌城。

昏王无道妲己宠，残害忠良理不通。二九头，随冷寒，文王渭水去访贤。太公手执钓鱼竿，周朝永固八百年……

报春甚或报喜是春官唱词不变的主题，但借助历史现象、生活现象、自然现象，对其蕴含哲理加以深刻剖析和充分张扬，以期达到劝善乃至延续人类文明的目的，也是一个重要主题。诸如《十二送春劝世文》之类是春官说春唱词的一种主要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春官说春唱词永远只是一种行游诗，且往往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并不具有固定版本，也没有固定内容和唱词。

春官说春唱词作为一种民间行游诗其价值取向的核心是报春报喜，这些春官及其说春唱词所扮演的无疑便是春天的报喜鸟乃至喜神的角色。喜神被人们誉为吉祥如意之神。礼县西和一带还流行正月初一清晨开门迎喜神的民俗。春官说春唱词不过是将这种恭迎喜神的民俗提前并以具象化民间行游诗方式加以表达而已。

礼县西和一带的春官，在某种意义上与西方神话乃至民俗中的圣诞老人一样有着某种

程度的满足人们愿望的特点和功能。所不同的是，如果说西方圣诞老人对小孩愿望的满足只是一种以神话人物身份进行的貌似真实实则虚幻的满足，那么礼县西和一带春官对人们愿望的满足则是一种貌似虚幻实则真实的祝愿和祝福式满足。这使西方圣诞老人的虚幻满足更具有宗教的神秘色彩，使礼县西和一带春官们的虚幻满足更有文学艺术的性质和特点。人们可以这样评价春官说春唱词：如果中国确实存在民间抒情诗人乃至民间行游诗，礼县西和一带流行的春官说春唱词是中国民间最具职业特征的抒情诗人所创作的民间行游诗，并且是真正以平等普化作为主要价值取向所创作的民间行游诗。这些民间行游诗人乃至行游诗所传播乃至传承的不仅是农历，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精神。

【刊载】《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民俗医疗、医疗民俗与疾痛叙事研究述评——兼论建构医疗民俗学理论范式的可能性》

【作者】戴望云（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

【摘要】

一、引言：民俗医疗与医疗民俗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患病之后，除了求助专业医者，亦有相当一部分人会采用民俗的行为来试图帮助治疗，如问神、占卜、偏方、食疗等，这些民俗行为的医疗效果无法在统计学意义上得到表现，需要从文化层面去关注。“民俗医疗”在较宽泛的意义上，可理解为“传统”与“大众”医疗活动的交叠集合，具有多个面向，是一个基于民间、源于生活、由地方性的文化知识孕育出来的医学体系。

台湾地区的民俗学学者和人类学学者长期关注台湾地区民间社会的民俗医疗，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张珣和郑志明的研究。这些论述分析了民俗医疗所体现出来的特质和体系性：这种种行为与方法，是以社会文化与观念为内生之源，其内核是一套富有再生产能力的知识与信仰，是由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所认同的，并以生活经验的形式传承。这些特质的凸显与体系性的浮现，使得把民俗医疗现象整合起来、不仅研究现象的意义且还解释医疗活动中民俗行为规律的“医疗民俗”研究呼之欲出。本文将通过对医学人文相关

研究的综合评述,分析民俗医疗与医疗民俗研究的特点和路径,结合民俗学偏好叙事研究的特点,论述病人之疾痛叙事对于医疗民俗学的方法论意义。

二、疾病与身体经验的文化主义研究

既有的疾病与身体经验的文化主义研究,普遍将疾病视为一种多方面交叉关联的产物,而不只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非正常现象。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强调人的疾病所隐喻的道德评判和政治态度。拜伦·古德(Byron Good)认为疾病不只是身体状况的单义表达,疾病对某个社会的成员来说是相互联系而呈现的一个文化综合症。罗伯特·汉(Robert Hahn)认为,是社会文化建构了其社会成员思考与感受疾病和治疗的方式。从这些整体性的理论联系到具象性的研究,便可发现研究者对于民族医药(ethnomedicine)体系中的疾病/健康观是如何建构出来的,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如罗芙芸(Ruth Rogaski)、叶永文等,明确指出并充分论述了气、及其相对应的宇宙论体系(阴阳、五行),费侠莉(Charlotte Furth)更是创造了“黄帝的身体”(the Yellow Emperor's body)这个解释模型。这套宇宙论形塑了中国独特的平衡医学及其对疾病治疗的全观式偏好,发展出了对疾病认知、解释、命名、分类、预防、治疗的一整套知识、信仰与行为,亦产出了一系列难以与普遍性知识达成精确互译的地方性知识,这些都成为了对于中华民族医药地方性知识研究的重要论题。

三、医疗议题的民俗学与人类学研究

在关于医疗的经典民俗学研究中,“巫医同源”是首要的研究话题。因“巫医同源”,民俗学树立了研究医学之信仰根源的传统,对于民间医学现象的研究侧重于突显其“巫术”或者“迷信”的意涵。江绍原关于“身体—巫术—医药”的历史民俗学研究,其所关注的人之大小身体相互感应的话题,也是在后来的医疗民俗研究中反复出现的经典话题。

在民俗的信仰空间里,中华医药的传统亦与诸多神话传说的叙事原型相关联,此外,民间诸多对药王、医神的崇拜活动,同样是以人物的灵性故事为叙事原点的。关注这些民俗叙事及其之解构研究,可以发现传统叙事的现代传承与发展,认识到在医学的领域中现代的科学精神与传统的道德精神并不割裂。

在当代社会中,民俗医疗因其原始/传统的性质,存在感较为显著的是少数民族地区

和乡村地区。近年来学界对于特定族群和乡村社会的民俗医疗现象及体系，多采用医学人类学的解释框架。医学人类学认为，复杂社会中的医学现象通常存在“医学多元主义”(medical pluralism)的特点，“神药两解”便是受信仰指导的典型医学多元主义现象。从批判医学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刘平安、杨善华和梁晨、张剑源等的研究表现的是乡村社会关于医学的“地方性知识”。

四、疾痛叙事：医疗民俗研究的可行方法论

聆听和采集故事是民俗学典型的研究方法，医疗民俗的研究必然面对疾病的叙事，但这种叙事不应只由医学的专业语言来构成，日常生活中的民众是建构和践行医疗民俗的主体，所以他们关于病痛之日常经验的叙事，应成为医疗民俗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论、以及疗愈病痛和生命的方法本身。从病患的叙事及这种叙事所产出的意义中，疗愈的力量与方法得以发现。丽塔·卡蓉(Rita Charon)提出和定义了“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即要求医生在医学实践中具有“吸收、解释、回应故事和其他人类困境的能力”。实际上叙事的疗愈作用(包括“自治”与“他疗”)可以追寻到更为远久的历史痕迹。原始部落中萨满的唱词有缓解、治疗疾病的功能，宗教仪式中的“忏悔”和中国传统医学实践中的“讲病”都蕴含了“叙事”的脉络和力量。阿瑟·克莱曼将“疾痛叙事”(illness narratives)引入到慢性病的临床治疗之中。“疾痛”指人的病患经验，既包括疾病可怕的症状给人带来的苦楚和困扰，也包含了病人及其家人“如何接受病患事实，带病生活的，又是如何对付和处理病患的症状以及由之引起的各种困苦烦恼的”。“疾痛叙事”作为一种方法论，亦对疾病的社会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民俗医疗与医疗民俗的研究，可采用“疾痛叙事”的方法。而医疗民俗学视野下的疾痛叙事研究在描写病人的认知与行为、探讨“病人文化”的建构之时，可在病人对于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认同和利用这一点上多加关注和发掘。

五、结论

通过上文对于民俗医疗、医疗民俗以及叙事医学相关研究的理论梳理，可以看出：(一)疾病同时也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对疾病及其治疗的解释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二)病人的疾痛经验有社会文化的形塑，但其叙事也富有主体建构性，因此可以建构一

个面向疾痛的生活世界，以及一套与疗愈的生活方式密切关联的病人文化。

借鉴民俗学家田兆元对“认同”与“建构”的认识以及围绕着认同的轨迹，民俗经济得以构成一个经济民俗体系的思想，我们认为，围绕着文化认同的轨迹，对于民俗医疗的种种行为与方法以及病人文化的建构，可以在医疗民俗学的视野下做出更具开放性与系统性的考察。

此外，对医疗民俗的研究，不必局限在传统的、狭窄的“民俗”意义之上，从患病者，尤其是“带病生存”的慢性病患者群体对传统文化和民俗生活中疗愈之道的利用入手，来探究这个群体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所建构的疗愈模式与生活风格，应是一项有意义的民俗学研究。建构一个宏大的“医疗民俗学”理论范式，尚有太多空白需要填补，但医疗生活中的文化认同与建构，是这一理论的起点和基石，强调病人主体建构性的疾痛叙事，是其中重要而可行的方法论。

【刊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文化实践

· 国内信息 ·

风雨同舟,以艺抗疫——各地民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文艺创作活动综述（二）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新疆、广西、湖北、四川、江苏、辽宁、浙江、上海、安徽、福建、广东、河北、河南、宁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地的民间文艺工作者紧随抗击疫情的各个阶段，创作出一批又一批以艺战疫的优秀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文艺工作者们对疫情防控阻击战进展的密切关注，他们艺术创作的内容也随着情势的变化而更新。例如张薇的剪纸作品《因为爱你 离你一

米》。目前随着各企事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不可松懈，倡导人与人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张薇运用大块面的留白和4个小场景的镂空形成对比，4个小场景的外形是葫芦，寓意一米距离能带给你平安幸福，一米之外，也能诠释真爱；以中间人物的头发串联4个小画面，意在表达“爱的方式不一定零距离，爱你的心一定是零距离”。在故事作品中，除了歌颂最美逆行者出征的勇敢、白衣天使的坚守以及无数志愿者和热心人守望相助的情谊，也出现了如《一张暖心的红色“强制令”》这样表现“用贴心的关爱和人性化的举措来确保一线人员的平安和健康”的新编内容。

剪纸依然是抗疫作品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但近期艺术家们也开始尝试用广东花灯、河南麦秆画、河北玉米秸秆画、广东钉金绣裙褂、广东张田饼印、安徽杜氏刻铜、广西隆林壮族背带以及脸谱、纸烙画、玻璃篆刻等载体来灵活呈现抗疫内容。例如在背带作品《万众一心共抗疫情》中，隆林壮族背带代表性传承人黄碧瑜采用不同颜色的布料，剪成6片花瓣形状，利用丝线在花瓣上绣出共抗疫情、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字样，并配以花朵、蝴蝶、蜈蚣等传统图案。作品色彩搭配对比强烈，工艺精致。黄碧瑜希望借此向抗疫一线的工作者致敬，在祝愿一线工作者百毒不侵、健康平安的同时，也表达万众一心、共抗疫情的斗志和信念。在民间文学作品方面，故事、民歌、说唱以及民间小戏的传播效果依然较为突出，此外，民族乐器独特的声韵也对抗疫作品的流传大有帮助。例如由桐雨作词、王宇作曲，京族独弦琴艺术广西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赵霞演奏的作品《呼唤》。这是一首具有浓郁南国风情的声乐作品，旋律素材来源于京族民谣《出海谣》《敬香歌》等，优美婉转，清新动人，表现了京族人民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关怀和慰问。

中国民协也联合各地的民间文艺工作者、民间艺术界的艺术家们，陆续在微信公众号以及抖音平台上连续发布和更新“我想对你说……”系列视频，以单人短视频的形式送祝福、传信心。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进展牵动着全国民间艺术家的心，他们通过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用心用情用功书写当下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精心创作出了一首首新时代的英雄赞歌。

（根据中国民协及各地民协战“疫”主题创作的系列报道综编）

来自剪纸界的爱和信心

——中国民协抗疫主题剪纸作品特展

2020年新年到来之际，一场始料未及的疫情从湖北武汉肆虐开来，在国人不经意间，扩散到全国几乎所有省份。武汉因此而封城，一时间不少人谈病色变。在举国抗疫防疫的关键时刻，中国民协剪纸研究中心发起了以抗疫防疫为主题的剪纸艺术作品网络展，用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民间艺术方式，表现抗疫防疫一线白衣天使的英雄壮举，表达全国人民对抗疫防疫的关切和决心，这次活动得到全国民间艺术家的热烈响应。从2月17日发出通知征稿，到2月21日结束投稿，共收到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的来稿一千多幅，黑龙江、吉林、辽宁、福建、广东、甘肃、陕西、山东、江苏、河北、河南、云南、四川等多个省民协组织推荐了作品投稿。中国民协组织专家对来稿做了初步评选，从中选出300多幅，供展览选用。这些作品在中国民协官网微信平台上集中展示。

民间文艺里很多艺术形式具有反映迅捷的特点，技法成熟，出手快，见效快，风格独特，主题鲜明，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欢迎，剪纸艺术便是突出代表。从大兴安岭到南海之滨，从胶东半岛到西部边陲，在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沿途，都有中国剪纸艺术的传承。这一次围绕抗疫防疫主题展开的创作，主题高度集中，以网络媒体作为展示手段，它必将留存在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史册上，成为壮丽的一笔。我们期待民间艺术家用更多更丰富的艺术形式，歌颂我们时代最可敬的人，表达我们时代最厚重的生命进行曲，履行民间文艺家对时代的神圣承诺！

（中国民协供稿）

· 国际信息 ·

◆以艺战“疫”：中国文艺小分队参演新西兰北帕多元文化节

3月7日，新西兰北岛城市北帕默斯顿（以下简称“北帕”）年度文化盛事——北帕多元文化节在当地市民广场盛大举行，吸引近一万名市民参加。惠灵顿中国文化中心应邀

参演，与新西兰毛利族、印度、阿富汗、库克群岛等 20 多个族裔的表演团体共同为当地观众奉上精彩纷呈的文化大餐。该文化节由北帕市议会、马纳瓦图多元文化委员会等机构联合主办，自 2 月 29 日持续至 3 月 8 日，其中 3 月 7 日举办的“世界集市日”是文化节高潮兼收官活动。

鉴于新西兰境内自 2 月 28 日确诊首个新冠肺炎病例，并于 3 月 7 日扩大到 5 人确诊，惠灵顿中国文化中心在此特殊时点及时调整演出内容，特意为现场观众奉上一系列提振士气的器乐演奏与舞蹈表演，携手当地民众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应对或将到来的疫情。中国文化中心器乐教师孙雁书率先登场，为观众献上一首激昂且不失深情的《你鼓舞了我》和在新西兰家喻户晓的毛利情歌的竹笛演奏。中国文化中心舞蹈教师张雅，则为北帕多元文化节带来精心改编的蒙古族舞蹈《筷子舞》，极富感染力的动作与粗犷豪放的蒙古族音乐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由中国文化中心器乐教师李采奕演奏的旋律奔放、气势磅礴的二胡名曲《赛马》再度点燃了现场观众们的热情。

此次多元文化节活动联络人、北帕侨领彭平表示，文化艺术具有抚慰心灵、激发斗志、凝聚力量的无形作用。“中国文化一直在北帕多元族裔文化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此共抗疫情的非常时期，中国文化中心带来的精彩演出无疑激起了北帕民众的情感共鸣，也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当病疫袭来时如何秉持积极乐观、顺势而为、以不变应万变的价值理念调整情绪心态及生活方式。”彭平如是说。惠灵顿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郭宗光表示，以优秀的文化作品感染人心、鼓舞士气，是文化工作者的使命，希望通过这些主题积极、情感真挚的文艺节目，向新西兰社会各界传递中国文化中心与当地民众携手对抗疫情的决心与信念，以艺战“疫”，共克时艰。

（来源：中国文化中心，辑录：覃奕）

◆巴基斯坦文学院将以 72 种语言出版民间文学文集

3 月 11 日，巴基斯坦文学院（Academy of Literature Pakistan）发布新闻称该学院将以 72 种语言出版巴基斯坦文学和民间文学作品，将其作为文集出版。同时，该文集的内容也将被数字化。

巴基斯坦文学院院长尤瑟夫·寇什博士 (Yousuf Khosh) 称, 弘扬巴基斯坦语言和文学是巴基斯坦文学院的主要宗旨所在。该学院还将把注意力投向弘扬巴基斯坦各个不同地区的语言。

这项以 72 种语言出版的文集工程将通过文学的形式展示巴基斯坦文化中不同的色彩。同时, 该工程也将成为联结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文学纽带。寇什博士表示, 巴基斯坦文学需要大家共同来保护, 巴基斯坦文学院也将进行体系改革, 以推出更有效的措施来促进本国文学的发展。

(来源:

<https://www.aaj.tv/english/latest/pal-to-publish-pakistanis-literature-in-72-languages-as-an-anthology-dr-yousuf-khushk/>, 翻译: 陈婷婷)

◆阿联酋沙迦酋长对阿联酋文化遗产立法

3月9日, 阿联酋最高委员会委员和沙迦酋长谢赫·苏丹·本·穆罕默德·卡西米博士 (HH Dr Sheikh Sultan bin Muhammad Al Qasimi) 颁布 2020 年第 4 号法令, 对阿联酋境内的文化遗产立法。该法令适用于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及水下遗产和在阿联酋境内的外国物质文化遗产。该法令称, 阿联酋境内的物质文化遗产, 不管其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水下, 都是公共财产。该法律规定, 有关当局应与政府部门合作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文化遗产。对于破坏文化遗产的相关人员将处以不少于两年的徒刑, 并处 272 万美元以下、13 万 6 千美元以上的罚款。该法令自宣布之日起生效。随着该法令的生效, 1992 年第一号法案《古迹法》将失去效力。

(来源:

<https://www.constructionweekonline.com/business/263521-hh-dr-sheikh-sultan-issues-a-law-on-cultural-heritage-in-sharjah>, 翻译: 陈婷婷)

